



讲座丛书

第一编

◎ 周和平 主编

WEN
JIN
YAN
JIANG
LU

文津演讲录

之十二

國家圖書局出版社



讲座丛书

第一编

◎ 周和平 主编

WEN
JIN
YAN
JIANG
LU

文津演讲录

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津演讲录之十二 / 周和平主编.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5

(讲座丛书第一编)

ISBN 978 - 7 - 5013 - 5251 - 7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3970 号

书 名 文津演讲录之十二

著 者 周和平 主编

编辑小组 赵大莹 曹菁菁 孟化 戴季

责任编辑 初小荣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 - 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7千字

印 数 1—1000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5251 - 7

定 价 45.00元

前 言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曾经被众多的读者亲切地称为“老北图”,在20世纪50年代,就因成功地举办学术讲座而为社会各界人士所称道,老舍等一代文化巨匠都曾作为这里的主讲人传道授业、答疑解惑。2001年新年伊始,国家图书馆分馆(现古籍馆)为继承“老北图”的优良传统,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图书馆扩展文化功能,全方位、多角度传播文化信息的客观要求,举办了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名人系列讲座。昔日曾亲耳聆听老一辈学界泰斗教诲的莘莘学子,如今也作为各学界的骄子走上这神圣而庄重的讲坛。

数年来,我们举办了文史、政经、音乐、美术等系列讲座数百场,听众数万人次。从他们渴望的目光里,我们感到了肩上的重任;从他们满意的笑容中,我们感到了由衷的欣慰。许多专家学者和读者通过讲座,成了图书馆的朋友,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可贵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而更多的人则经此渠道记住了国家图书馆,记住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的褒奖。

为了感谢各界朋友的支持,我们选出部分讲座内容,汇集成册,系列出版,给主讲人和听讲者一个留念,给不巧未曾听讲者一份补偿,也给我们的工作一个小小的总结。

所选讲稿,主讲人多为年近古稀的学界名流、文坛泰斗。他们用毕生心血,焚膏继晷,皓首穷经,故而成绩斐然,蜚声士林。

当然,这里所选的部分,并不能代表更不能涵括讲座的全部内容,而且我们自己所做的努力,在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这一宏伟大业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坚信,只要我们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史上,将会留下我们探索的足迹。

编者

目 录

- “祖宗之法”与北宋前期政治 / 邓小南 / 1
- 唐代官吏的培养和选拔 / 吴宗国 / 33
- 忽必烈的元帝国与蒙汉二元政策 / 李治安 / 65
- 制度变革滞后与清王朝的覆亡 / 雷颐 / 89
- 敦煌学及其他 / 郝春文 / 117
- 中国族谱学的若干思考 / 常建华 / 151
- 明中叶以降知识人的讲学活动 / 赵园 / 187
- 大炮与银两：晚明的军事改革 / 李伯重 / 213
- 阅读南宋：对一个时代的理解 / 包伟民 / 255
- 辛亥革命四大问题的再探讨 / 杨天石 / 277

邓小南

“祖宗之法”与北宋前期政治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人文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务院参事、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著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等,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文津讲坛,谈谈我对北宋前期政治的一些想法。

我们首先把整个的“祖宗之法”和北宋政治的脉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今天要讲到的问题其实是四个方面,其中主要谈到的是前两个问题,即对于宋代历史的再认识和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防弊原则。第一个问题是提供一个整体的观察背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讲的“祖宗之法”的核心,即什么是宋代的“祖宗之法”,这个“祖宗之法”有什么样的精神原则。后两个问题,我们会简单地谈一下,一个是当时的人——宋代的人,对于宋代的“祖宗之法”,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认识;另外,就是在宋代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后来的人有哪些反思和批评。

说到宋代前期的历史,首先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朝代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从公元前 221 年进入秦朝,开始进入帝制时期,皇帝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一直到清王朝的灭亡,这中间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宋代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呢?如果以帝制时期大致上是两千年计,那宋代正好差不多是在一千年的转折这样一个时段上。宋代的历史基本上是三百多年的时间。今天要讲的是北宋的前期。为什么要回顾宋代的历史呢?近代以来,很多国学大师都从他们对时代的关怀,从他们的学术立场出发,对于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包括宋代有深刻的观察,

也有一些概括性的表述。

严复先生是近代以来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初写给熊纯如的一封信里就说道，“古人好读前四史”（“前四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为什么呢？严复先生说主要是因为“前四史”的文字比较好。但是假如想要研究人心的变化、政俗的变化，那么他觉得赵宋一代的历史是最值得关注的。为什么叫赵宋呢？因为宋王朝的统治者是赵匡胤这个家族，所以历史上习惯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赵宋。严复先生说，赵宋一代的历史“最宜究心”。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为善为恶、是好是坏，就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上来观察，可以看到中国近代以来的面貌，其实是宋代所塑就的，也就是说“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可以看到宋代和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之间的一种血脉上的联系。

钱穆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也有很多的讲法涉及宋代。历史其实就是看变化，他“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认为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宋代。宋代以前大体上可以称之为古代中国，宋代以后就是后代的中国。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也有类似的说法。现在国际汉学界非常流行的“唐宋变革说”，其实是把宋代视为中国历史上从中世迈向近世的开端。这些都是对于宋代历史意义的重要观察。

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指出，华夏民族的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进过程，在宋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巅峰状态。

有一位旅美的中国史学家黄仁宇，他出过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当初影响非常大。他还有另外一些通史性的著述，像《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等。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本书里，他分章分节地叙述中国历史上的

各个主要朝代。在讲到宋代的时候,开宗明义地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他讲到了一些宋朝历史上看似非常矛盾的现象。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宋代的开国君主是赵匡胤,赵匡胤是何种人物呢?他其实是职业军人出身,一个禁军统帅。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真正马背上得天下的君主并不少,从刘邦到朱元璋、努尔哈赤这些人,都可以说是马背上得天下的,但是很少是职业军人出身。在主要王朝中职业军人出身的君主只有赵匡胤。但是赵匡胤这个天下不是靠武力打来的,他反而不是一个马背上得天下的君主。在他当政期间,以及他所建立的这个王朝发展的300年中,偏偏是军事上的力量不振始终受到批评、受到诟病,是赵宋最主要的弱点。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造成的?类似的问题在宋代的历史上有很多,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思考和研究的空间。

第一个问题是,“宋代历史再认识”,从时间、空间和基本评价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这个时期有什么样的再认识。

首先,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现在做历史研究都是提倡做长时段的探索,就是说要在历史发展、演变的长过程、长脉络中,去寻求某一个时间点,它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它的地位。如果做这种长时段的探索,会注意到历史上各个时期之间的延续,各个时期之间的关联;另外,会注意到各个时期之间的变迁,或者说各时期之间的转型。

从延续和关联的角度来讲,钱钟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参与了《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的写作,他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说到文学会说唐诗宋词,会把唐宋连在一起讲;说到绘画会说宋元文人画,会把宋元联系在一起讲;讲到学术思想会说汉学、宋学,不管是

讲到文化史上的哪种发展脉络,都会说到宋代。这是从延续的角度来看。

从变迁的角度来看,刚才曾经提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来的“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论”从上世纪初期以来影响国内外的汉学界,几乎影响了一百年。最近这些年,不光是有人把唐宋之间的变革作为一个讨论关心的热点问题,另外也会考虑到宋元之间,或者是宋明之间的延续和它的变革。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葛兆光先生,曾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唐宋’抑或‘宋明’”,在长时段中,唐宋联系在一起考虑,或是把宋明联系在一起认识,凸显出来的内容或许会不同。讲到唐宋,会把宋代看成是一个变革期的收束阶段;讲宋明,则会把宋代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1982年美国宾州大学教授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把公元750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前的一段时间,一直到公元1550年,就是明代的中叶,这八百年的历史作为一个研究的单元。从此以后,这种长时段的探索,就受到了学界普遍的关注。200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Song Yuan Ming Transition*,就是讲宋代到元代,再到明代,这种变迁的脉络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些都是从时间上来看,是一种长时段的探索。

宋代的历史通常被称作“两宋”,即北宋和南宋。北宋是指国都建在开封的一段时期(960—1127),后来开封被女真民族建立的金王朝占领,北宋王朝覆亡。王朝一路南撤,迁到了现在的杭州,称为临安,意思是临时安顿在那里,首都南迁了,所以后来的历史就被称为南宋,合称为两宋。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并不是整个宋代的历史,而是北宋前期的历史,大致上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这样一个历史时段。对于其

后的历史,会多少有一点涉及,在第一个大问题里涉及对于宋代的整体认识,作为一个主要的背景。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根据北宋时期的疆域图可以看到,如果和汉唐时期的旧疆域做一个比较的话,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或者说它所完成的不是彻底的统一。汉唐原有疆域西部北部的大片地区,实际上都不曾在宋的统治之下。所以从疆域来讲,或者说从空间上来讲,宋代所完成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北宋的统一,是在什么基础上实现的呢?这里有一幅图,反映的是五代十国的形势。如果把它和北宋的疆界轮廓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同样的地区。宋代并不是直接继承唐的天下,而是继承了五代十国的天下。五代十国,在北方,以开封、洛阳为政治中心,有前后相继的五个朝代;在南方有先后出现的九个小国,加上在太原的一个北汉,通称为十国。五代十国是从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状态之中发展过来,是一种上上下下非常彻底的分裂割据的局面,在当时并立的政权之多,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宋代的统一,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主要是农耕地区的统一。也就是说,从疆域面积来讲,宋代的统一并不是彻底的统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宋代的统一,其纵深度,它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度,要远远超过它前面的王朝。

举例来说,汉代是怎么灭亡的?汉代并不是灭于黄巾起义的,黄巾起义之后,它还维持了一段时间。它真正的覆亡发生在董卓、曹操、袁绍等人“群雄并起”的过程中,这些人本来就是汉王朝在后期扶植起来的地方军阀势力。唐代是怎么灭亡的?唐代不是灭于黄巢起义,它是被宣武节度使朱温取而代之,它也是灭于自己扶植起来的地方军事势力。而这样的状况,宋代以后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宋代通过中央集

权,对地方实行了比较有效的统治。这也就是说从疆域的广度而言,宋朝所完成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它对内统治所达到的纵深的层面和控制的力度,应该说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幅叠压图,是宋代的政治地理疆域和自然地理区域的叠压。从左下角的图例可以看到,这三个大区都是根据自然地理状况划分的。第一个区域——东部季风区,指的是从东部海洋吹来的季风最远能够达到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沿着大兴安岭,经过蒙古高原、阴山山脉,然后再到青藏高原的东部,一直延续下来,它大体上和四百毫米的降水线是重合的。这条线以东以南的地区,基本上是农耕民族活动的地区。当然在北方的高寒地带,只有一些粗放的农耕,以及渔猎之类的生产活动。第二个大区,是西北干旱区,传统上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第三个区域是青藏高原区。红色曲线是北宋的疆域。北边的这一条就是现在的拒马河,也称作白沟。白沟之所以会形成为宋辽之间的分界线,和当年石敬瑭割让幽蓟十六州给契丹人有关。后周世宗时,部分收复了关南十县地。所以这一条线是在比较强烈的人文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而在北边、西北边和西边分界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疆域的分界线和自然地理的界线有高度的重合。这提醒我们注意,如果当时农耕、游牧各个民族之间,彼此力量比较均衡的时候,那么农耕民族就很难把统治触角伸到游牧地带去,反过来也是一样,游牧民族也不容易把触角伸入到农耕地区来。而当农耕民族,或者游牧民族的力量壮大的时候,自然地理的这样一个界线,就限制不了他们。比方说,汉唐强盛时期,或是蒙古民族勃兴之后,就明显突破了这样的限制。

宋代的历史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展的。所以我

们可以看到,尽管今天要讲的“祖宗之法”是讲宋代的内政问题,但宋代的内政始终是处于外部压力之下的内政。现在通常会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内政是外交压力下的选择。那么这种压力,对于当时的人,对于当时人的观念,对于当时的一种政治的格局,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举一个来自史料的具体例子。南宋人李焘所作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一段叙述,讲的是景德元年(1004)宋辽“澶渊之盟”的情形。“澶渊之盟”发生在宋真宗时期。当时辽军南下,到了澶州(即今河南、河北交界的濮阳),宋和辽之间产生了一次军事碰撞,在这一过程中,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叫做“澶渊之盟”。盟约中,双方互相承认是兄弟之国,宋方承诺要给辽方“岁币”,边境地带开设贸易榷场,等等。除去具体条款之外,当时的人还注意到什么呢?从李焘的叙述里可以看到一些征象。《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注文,把双方缔盟的国书都录在这里。它说某年某月某日,“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对方则是说,“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奇怪,兄弟之国嘛,反正都是互相平等的称谓。但是在当时对于人们所理解的“天下”、“中国”的秩序格局,是有非常强烈的冲击的。像“天下”“中国”这样的概念,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中国”在当时是与周边相对而言,从核心向周边辐射,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秩序的概念,或者说是想象的空间。而到了此时,双方的誓书里边都强调各守疆界,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从一个秩序的概念,变成了有特定的疆域限制。在这样一个疆域之中,也就凸显出了它的主权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来看,特别是从当时人的观念来看,这是很大的变化。从“时

间”发展中观察“空间”认识的变化,宋代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另外,过去都是说“天无二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天子。而现在,在大宋皇帝的旁边,又出现了一个大契丹皇帝,而且是大宋皇帝亲口承认的“大契丹皇帝”。这事实上是对于既往秩序观念的严重冲击,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在这样的一种时间和空间背景之下,古代中国关于民族、国家、天下的认识,以及关于“朝贡体制”、“华夷之辨”的概念,都是在宋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葛兆光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做《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就说“中国”这个意识其实早就有了,但是在宋代凸显出来一些不同的含义。当时宋代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遇到了挫折,和兄弟民族建立的周边政权,彼此之间是一种对峙的、鼎峙的形势,不是四方辐辏的朝贡局面了;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文章里把这种“中国”意识视为近世以来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开端,一个渊源。

宋代《春秋》学比较发达,对正统论有很多的讨论,这都和当时面临的敌国、外患这样一种背景有直接的关系,都希望证明中原王朝的政治合法性,要寻求一种有力的解释。这些年,西方的汉学界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比较早的一部是 *China Among Equals*, 1983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讨论在周边政权环立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存在与发展。书名副标题说的“Middle Kingdom”,就是指“中国”,作者把“中国”翻译为“处在中间位置上的王国”。2007 年出版的 *Unbounded Loyalty*, 主要是讲辽代的情形,也提到了宋辽的关系,特别是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之间开始有了明确的边界线。这与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有非常大的差别,过去的边界基本上是流动的,不

确定的。2008 年底出的一本书,是一位德国学者 Kuhn 写的,它是讲儒家学说统治下的中国,也讲到了持续不断的外部军事的压力,迫使宋代的人们产生了一些新的观念: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有了新的认识。哈佛大学的教授包弼德(Peter Bol),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这个概念。他不同意把“中国”翻译成为“Middle Kingdom”,他认为“中国”应该翻译成“Central Country”。“Central”是中心的、核心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有一种文化上、制度上、政治上、文明上的辐射。

总的来讲,在这一个历史时期里,相对于宋朝来说,周边的这些民族政权都成长为比较成熟的政权,不再是附属性的。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契机。当时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对于周边民族王朝发生着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作用。既然宋代当时是处在一种敌国环伺的状态下,它不再是天下一统的了,那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呢?

从中学的教科书,一直到现在的大学通史教材上,对于宋代的基本评价,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认识框架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对于这种认识框架,是不是有其他不同的看法呢?在这里举几部西方汉学家的著述予以说明。

第一部,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是讲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位长期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任教的英国史学家 Mark Elvin 写的一部书,主要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入手,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仅限于宋代的。他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真正所谓革命性的变化,是发生在 12 世纪前后。我们知道,当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宋代。当然对于 Mark Elvin 的这种论断,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辩驳意见,但是这部书